

## 魏晉南北朝「地理書」、「地記」文獻 與後世方志形成的關係<sup>1</sup>

劉寧慧<sup>2</sup>

**摘要：**《隋書·經籍志》史部地理類著錄，魏晉南北朝出現過一類地理作品，所謂「地理書」、「地記」之作。它們由當時的許多個人撰著，內容卷數不多，名稱以突出地理行政區劃的地名為主，各自記錄了地區性的自然環境與生活景況資料。然而它們幾乎沒有一部作品完整留存至今，我們只能從清代以來的輯佚成果略窺一二。作品內容以外，此類文獻的產生也欠缺當時及後世的討論。而在其後五百多年的南北宋之交，這批文獻又悄然自圖書目錄中隱去，甚至沒有引起宋元時代的注意與質疑。類似性質的作品，前此幾乎未見。特種文獻來得自然，去得無聲，這在當時文化界的意義是什麼？有什麼歷史背景因素是我們還沒有敏感繫連出來的？又有何種影響與效應是有待析理廓清的？尤其它們的發展始終關連著另一個重要議題，即宋代方志體裁的產生，不論是作為方志前身還是促進的一環，都沒有完全脫去它的話題性。是以推論它的發生與書寫，一方面是試圖理解它的文獻定位，解釋六朝歷史與社會的特殊心態；二方面從它的發展及亡佚過程，探索它們在方志體裁形成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關鍵詞：**地理書、地記、方志、魏晉南北朝、六朝

<sup>1</sup> 收件日期：2021/03/29；修改日期：2021/07/01；接受日期：2021/07/30

<sup>2</sup> 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副教授

## Relation Between Establishment of Di Li Shu and Di Ji in The Wei-Jin-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Geography Records in the Following Generations<sup>3</sup>

Liu, Ning-hui<sup>4</sup>

**Abstract:** Geography category of Sui Shu Jing Ji Zhi recorded the existence of geographic work “Di Li Shu” and “Di Ji” in Six Dynasties. They were written by the individuals at the time. The volumes were few and the names of the books were based on the place names in geographic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They recorded the regional natural environments and life situations. Most of them were not properly preserved and we can only study them from the generalization results from Qing Dynasty. These literatures silently disappeared from the catalogues in 1130 and they even did not draw the attention of the scholars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hat wa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silent literatures in the cultural circle at the time? What are the historical factors which we did not recognize? What are the effects which we should analyze and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is associated with another important issue: the birth of

---

<sup>3</sup> Received: March 29, 2021; Sent out for revision: July 01, 2021;  
Accepted: July 30, 2021

<sup>4</sup>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Chinese Geography Records in Song Dynasty. They are important as the former or drive of Chinese Geography Records. By reasoning the origin and writing,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osition of the literatures and elaborates the history and society of Six Dynasties. In addition, by the development and declination, it probes into their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genre of Chinese Geography Records.

**Keywords:** Di Li Shu, Di Ji, Chinese Geography Records,  
The Wei-Jin-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Six Dynasties

## 一、前言

中國古典方志，傳世知見的數量超過萬種。在這萬餘種內容中，包含了南宋迄民國初年中國全域或各州縣鄉鎮的社會、經濟、文教、歷史、地理、建築、物產、名勝、風俗、人物等既豐富又細膩的生活史料，也陸續採取有門目、綱目、編年、紀傳、三寶等靈活多樣的體例進行整編，可說是一個總體文獻量龐大、文獻發展時期悠長、傳承久遠有緒、體裁成熟具創意且資料積累豐碩可信的文化資產。它的體裁成熟於南宋，但這一切成就當不是某個短暫時期所能完成的。

對於古典方志的起源，前人往宋代以前相關地理類文獻去回溯，而有淵源於上古〈禹貢〉、《山海經》及多源等說法。方志體裁形成的探究，則有北宋、隋唐「圖經」；魏晉南北朝「地理書」、「地記」乃至上溯漢代的脈絡式推求。然而，此課題有相當的模糊性與複雜度。首先，「方志」本身的界定難明，雖說今天一致公認南宋已屬體裁確立階段，但即使是南宋及後來的志書，也包含了所謂省、府、州、縣行政區劃為主的狹義方志及全國性總志、各門類專志之廣義方志。<sup>5</sup> 專類方志涵蓋有綜合志書中某些個別部類的內容，單記山水、風土、寺觀、名勝、園林、花木、人物、陵墓等，<sup>6</sup> 範圍廣泛。而志書名稱、內容體例則各類別都沒有固定模式。方志含義擴大，溯源的工作便被無止境展放乃至模糊焦點、難以對應。其二是南宋末以前的志書、相關地理文獻，不論名為「志」、「記」、「圖經」、「地理書」、「地記」等作品今幾皆亡佚不存（此敘述

<sup>5</sup> 劉緯毅等：《中國方志史》（太原：三晉出版社，2010年），頁4-5。

<sup>6</sup> 劉緯毅等：《中國方志史》，頁10-11。

將因不同方志概念而有異），僅有史志目錄的書目記錄、類書的採輯、部分殘卷及清代迄今輯佚之條列式結果。今天就算縮小探討範圍，事實上也已無由具體觀察南宋以前「方志」的相關發展，也無法據以說明古典方志體裁的起始與形成過程，致使學界對此問題迄今仍處推論狀態，也難怪林衍經於《方志史話》一書中嘆稱「已經成了一樁歷史公案」<sup>7</sup>。

方志淵源在相關資料留存不足的情況下，是否果真無法討論？倉修良以史學素養及個人體會，提出「方志發展三階段說」，認為方志由魏晉南北朝「地理書」、「地記」開展第一階段，歷隋唐「圖經」再成宋代方志，建構起方志形成脈絡。<sup>8</sup> 方志溯源問題有了單線化的概念，配合歷史時間進展，予人的印象倒也十足鮮明。

魏晉南北朝出現所謂「地理書」、「地記」之作，今天主要依據初唐魏徵（580-643）等《隋書·經籍志》（以下簡稱《隋志》）史部地理類著錄得知。它們由漢魏六朝的許多個人撰著，內容卷數不多，較為後世注意的是一批以突出地理行政區劃地名為主，各自記錄了地區性的自然環境與生活景況等資料的作品，如西晉陸機《洛陽記》、南朝宋盛弘之《荊州記》等。這些作品早佚失，具體內容不明，可是僅從作品題稱望文生義，很容易令人敏感地繫連起類似南宋范成大《吳郡志》、羅願《新安志》、施宿《嘉泰會稽志》等的「方志」概念，而抱持相當期待這與後世志書的源頭有關。

可惜「地理書」、「地記」幾乎沒有一部作品完整留存至今（《華陽國志》問題容後再敘），我們只能從清代以來的輯佚成果略窺

7 林衍經：《方志史話》（鄭州：中州書畫社，1983年），頁15。

8 倉修良：〈方志發展的三個階段〉，《方志學通論（修訂本）·第二章》（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年），頁169-170。

一二。作品內容外，此類文獻的產生與性質也欠缺當時及後世的討論。而在其後五百多年的南北宋之交，這批文獻又悄然自圖書目錄中隱去，甚至沒有引起宋元時代的注意與質疑。如果它在方志形成過程中確實承擔有階段性任務，一是直為方志前身，二是歸屬促進的一環，那麼我們都必須試圖在有限線索下盡力還原、理解它的可能發展，包括它產生的原因、蔚為風氣的緣由、撰作的理念、實質的記錄乃至佚失的因素等，以及與後世方志有何類同及關連、扮演了何種角色？進而據以詮解、建構方志成熟確立的一路發展脈系。當然，「地理書」、「地記」中類同後世志書的題稱，如某某州記、郡記，也不無可能純屬後人片面理解的結果，實與方志關連有限。而我們也有必要離析「地理書」、「方志」這兩種文獻的不同本質，以朝更加精準的方向推求「方志」真正的源頭。

然既有「千古公案」的形容，方志淵源應當不易尋得一個明確具體的答案。本文的討論，希望藉清楚的時間序，重新檢視「地理書」、「地記」文獻之相關記錄，找出它們在當代的概念及後世的推衍，分判它們的原始性質與認知。再通過後世佚文內容的綜合比較，突顯它們的書寫取向與意圖。此外結合魏晉南北朝社會、學術與思想上的種種特點，尤其將之與六朝至隋唐史學領域撰述連繫觀察，盼能獲取對此類文獻由產生到消亡的合理背景認識，以及做出它們與後世方志、方志體裁形成關連的判斷。

## 二、「地理書」、「地記」文獻概念與範圍之模糊

本文不斷提到「地理書」、「地記」、「方志」，在描述上它們似乎各有明白的義界、清晰的指稱對象及確立的體裁內容，但事實上從名義到內容，它們始終都處在駁雜的概念與文獻狀況中，不

易單純認識與界說。本節試以「地理書」、「地記」名義出現的先後，從時間序上觀察它們的發展可能、初始含義及概念變化。

### （一）南朝以前相關記錄的茫昧難明

魏晉南北朝以前的圖書記錄，主要依據東漢班固（32-92）《漢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漢志》）。《漢志》沒有地理相關類目，勉強望文生義於「兵書略·兵陰陽」及「數術略·形法」中找出「《地典》六篇」；<sup>9</sup>「《山海經》十三篇」、「《國朝》七卷」及「《宮宅地形》二十卷」<sup>10</sup>作為觀察對象。「兵陰陽」講用兵順時而發、依時而動的謀略技巧，但《地典》仍內容難明。《山海經》晉注曾出現在南朝齊的「地理書」範圍內，但未知與此十三篇的關係。《漢志》此類作品顯然是如小序所言「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的相法方術之作，<sup>11</sup>不管是性質與內涵都與南朝齊「地理書」關連渺遠。

東漢後的圖書著錄，據南朝梁阮孝緒（479-536）武帝普通四年（523）《七錄》序載，東晉袁山松（?-401）有「《後漢·藝文志》書」<sup>12</sup>，阮孝緒其時仍能見到，其後則佚失。又載三國魏有秘書郎鄭默（213-280）整理官藏秘書三閣，制《中經》目錄。《中經》很快即有西晉初荀勗（?-289）的重新整編，成《中經新簿》十餘卷，唐初《隋志》大序曾說明《中經新簿》的分類，「三曰丙部，有史記、

<sup>9</sup> 班固：《漢書·卷三十·藝文志》（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頁1760。

<sup>10</sup> 班固：《漢書·藝文志》，頁1774。

<sup>11</sup> 李致忠：《三目類序釋評》（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頁429-430。

<sup>12</sup> 任莉莉：《七錄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5。

舊事、皇覽簿、雜事」<sup>13</sup>，沒有提到與地理相關的類目。或許可據以推測直至西晉初仍沒有大量地理類文獻的出現。

「地理書」、「地記」文獻較可能的記載，來到晉郭璞（276-324）注《山海經》，引用「張氏地理記」、「張氏土地記」、「張氏地理志」及數次「地理志」。郭璞所引內容不見今之《漢書·地理志》；「張氏地理記」也未申明張氏何人？<sup>14</sup>但至遲在兩晉間應已有這部或這些作品。郭璞傳注引據多書，藉以徵實《山海經》內容所述的存在，引用《張氏地理志》等僅四條，如〈海內南經〉「三天子鄩山」注：「《張氏土地記》曰：『東陽永康縣南四里有石城山，上有小石城。云黃帝曾遊此，即三天子都也。』」<sup>15</sup>說明三天子鄩山在當時的具體定位與名稱；〈西山經〉注「鳥鼠同穴之山」，引「《張氏地理記》云：『不為牡牝也』」<sup>16</sup>，證明確有此動物特異性的相關記載。那麼在此的「地理記」內容主要呈現山川地理與物產之考證，不過究屬史書地理志作品還是另為他體述作仍未知。

東晉目錄，據載前期有著作郎李充再以荀勗《中經新簿》校朝廷藏書，或即《晉元帝書目》，後期則有未知名《晉義熙四年（408）祕閣四部目錄》及謝靈運（385-433）《宋元嘉八年（431）祕閣

<sup>13</sup> 魏徵等：《隋書·卷三二·經籍志》（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頁906。

<sup>14</sup> 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臺北：鼎文書局，1974年），頁51。引清王謨（-？1768？-）《張氏土地記輯本》，以書「必當為漢魏間人撰」，張國淦案語：「諸家引張晏外，有張敖、張勃。張敖未詳，張勃別有《吳錄地理志》」。

<sup>15</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5年），頁268。

<sup>16</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64-65。

四部目錄》，這些目錄俱已佚失，收錄情況不明。<sup>17</sup>又宋初有殷淳（403-434）《大四部目》、元徽元年（473）秘書丞王儉（452-489）有《宋元徽元年祕閣四部書目錄》；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510）、監謝朓（441-506）有《齊永明元年（483）祕閣四部目錄》，同樣皆所錄不詳。<sup>18</sup>但王儉另別撰有《七志》七十卷，這部七分法的目錄收書眾多，「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sup>19</sup>。「譜」應該指姓氏譜錄之書；「圖」則有圖譜及地圖，還有圖以外的地域之「書」。那麼在南朝宋，地理性的相關作品於數量上已不容書目記載忽略了。

其後南朝梁沈約（441-513）撰《宋書·州郡志》言：

地理參差，其詳難舉。……今以班固馬彪二志、太康元康定戶、王隱地道、晉世起居、永初郡國、何徐州郡及地理雜書，互相考覆。且三國無志，事出帝紀，雖立郡時見，而置縣不書。今唯以續漢郡國校太康地志，參伍異同，用相徵驗。<sup>20</sup>

除了所舉兩晉間王隱《地道》（《晉書·地道志》）、《永初郡國（志）》、何徐「州郡」（「何承天（370-447）《宋書》志」、「徐爰（394-475）《宋書》志」）及《（晉）太康地志》等史籍外，〈州郡志〉中仍再見到少量引據《永寧地志》；賀《續會稽記》；董覽《吳地志》；《吳記》；譙周（201-270）《巴記》；《廣州記》等作品，應即所謂「地理雜書」。沈約撰述正史，〈州郡志〉呈現東遷後州郡縣自兩漢到南朝宋的建置沿革，除分述各級政區的設治

<sup>17</sup> 任莉莉：《七錄輯證》，頁5。

<sup>18</sup> 任莉莉：《七錄輯證》，頁5。

<sup>19</sup> 魏徵等：《隋書·卷三二·經籍志》，頁907。

<sup>20</sup> 沈約：《宋書·卷三五·州郡志》（臺北：鼎文書局，1984年），頁1028。

省併情況，也簡記州郡戶口及去京都水陸道里，但未及地方山川、古蹟、風俗等資料。上述史籍、地理諸書，今皆亡佚，僅存部分佚文，整體內容已無法窺知。就沈約〈州郡志〉中大量引據的《太康地志》、《永初郡國》，幾涵所有政區，可見它們是全區式的地理內容，而幾部「地理雜書」皆引用有限且文字簡略，主要仍僅建置沿革訊息，是否具其他地方內容更難揣度。然而個人地方性撰述得以入列正史考稽，除了沈約苦於魏晉以來州郡移易頻仍，「邦名邑號，難或詳書」<sup>21</sup>的因素，需要眾多細部記載來輔成述作，一方面也呈現了南朝梁以前地理文獻之蓬勃了。

## （二）齊梁至初唐首見名稱與書目著錄

南朝梁記錄有據的官修目錄有殷鈞（484-532）《梁天監六年四部書目錄》、劉遵（？-535）《梁東宮四部目錄》及劉孝標（462-521）《梁文德殿四部目錄》，也都早佚不存。<sup>22</sup>武帝普通四年，篤好典籍的處士阮孝緒勤加搜羅圖書、廣泛寓目，甚至還曾將所見校之官目，在發現多所遺漏後，綜合知見，新撰《七錄》一十一卷。此目共收書 6,288 種、44,526 卷，<sup>23</sup>惜內容仍早佚，今天僅能據傳世序文了解部分可能情況。阮孝緒未明示收書範圍，序文中稱「總集眾家，更為新錄」<sup>24</sup>，所參考的目錄始自劉歆《七略》至梁初官修目錄並言「天下之遺書祕記，庶幾窮於是矣」。或許可推測，《七錄》內容包含了阮孝緒當時所能窮蒐知見之自古以來至當代圖書作品，

<sup>21</sup> 沈約：《宋書》，頁 205。

<sup>22</sup> 魏徵等：《隋書·卷三三·經籍志》，頁 991。

<sup>23</sup> 任莉莉：《七錄輯證》，頁 6。

<sup>24</sup> 任莉莉：《七錄輯證》，頁 3。

涵蓋程度相當高。六朝目錄已獨立出史部，阮孝緒設〈內篇·記傳錄〉，有「土地部：七十三種，一百七十一帙，八百六十九卷」。<sup>25</sup>

「記傳錄」即史部，《七錄》中史部小類數量最多，分類與類名也顯然經過深思細考、別出新裁。「土地部」是對記載地理、地方相關作品的類名概括，以 800 多卷的著錄量看來，極有可能是迄梁初為止新興地理文獻之初步總結。這是所知六朝人唯一一份獨立設類又具份量的專門收錄，若能見到實際書目，對掌握六朝人此類作品之概念必大有助益。可惜「地理書」更直接、具體的記載只得續往後查考。

梁蕭子顯（487-537）《南齊書·陸澄（425-494）傳》載：

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sup>26</sup>

齊陸澄有「地理書」之作，時間與作品名稱梁人已證稱。約百年後，初唐姚思廉（557-637）《梁書·任昉（460-508）傳》又記錄有：

自齊永元以來，秘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後，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sup>27</sup>

<sup>25</sup> 任莉莉：《七錄輯證》，頁 8。

<sup>26</sup> 蕭子顯：《南齊書·卷三九·陸澄傳》（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頁 681-686。

<sup>27</sup> 姚思廉：《梁書·卷十四·任昉傳》（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頁 254-258。

稍晚於陸澄的梁任昉撰「地記」也有了明確證實，但具體的「地理書」、「地記」內容仍未得見。唐高宗顯慶年間（656-661）成編的《隋書·經籍志·地理類》則首度較明確地記載、說明了這兩部書的情況。

《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

錄一卷。陸澄合《山海經》已來一百六十家以為此書。澄本之外，其舊事並多零失。見存別部自行者，唯四十二家，今列之於上。

……

《地記》二百五十二卷。

梁任昉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以為此記。其所增舊書，亦多零失。見存別部行者，唯十二家，今列之於上。<sup>28</sup>

《南齊書》陸澄本傳未言卷數及規模，唐人則記陸澄纂輯了 160 家地理文獻，成 149 卷《地理書》，平均一種作品不到一卷。而《隋志》列出的 42 種書目（今傳《隋志》實際見 39 種、86 卷），是收進陸澄《地理書》的別部單行本，那麼它們與陸澄《地理書》內容的關係應是四分之一家、種數的重疊，可卷數 86 為何已超出全書一半？合理的解釋或許應該是：陸澄《地理書》為撮抄、摘錄式作品，非後世叢書式的全書纂輯，所以收錄家數與總卷數明顯不符常理。且小序稱：「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為部，謂之《地理書》」<sup>29</sup>，所以它的內容是以地理方位為架構，按地方前後遠近重新安排，應已不見各原著次第及完整內容。而一部地理作品被擇要選錄進《地理書》後，未被採錄的部分就因原書

<sup>28</sup> 魏徵等：《隋書·卷三三·經籍志》，頁 983-984。

<sup>29</sup> 魏徵等：《隋書·卷三三·經籍志》，頁 988。

保存不易、多見零失。《隋志》因此據所見《地理書》一卷目錄，還原當初曾採錄過的原書並以完整全書型態進行著錄，是以會有郭璞注《山海經》二十三卷這樣大的內容。這或許也就是陸澄另撰目錄的緣由，因為它們在《地理書》內容中未必能具見。初唐其時，陸澄《地理書》尚存，它與此 42 家單行原書內容並未大量重複，是以在目錄上兩者並列。任昉所增為的《地記》，應該也是類同情況。

陸澄、任昉辭世僅相距十五年，又都是遍覽群籍的博學之士，《地理書》、《地記》總採錄漢魏兩晉宋齊高達 244 種地理圖書，南齊以前的相關文獻應該盡在其中了。光從家數、種數來看，遠多過晚了十餘年成編的阮孝緒《七錄·土地部》73 種。奈何《七錄》不存，《隋志》蒐羅有限，兩目都無法完整觀察，也無法進行收錄與地理文獻概念的比較，讓我們失卻了掌握此文獻性質的機會。就連《隋志》還原的共 52 種書目，今天也亡佚殆盡，要做陸、任地理文獻認知歸納實屬困難。阮孝緒經眼圖書、目錄豐富，應該不可能未知見陸、任二編，《七錄》別以「土地」統稱，或有類目取義的考量，但僅收書 73 種，至少在數量上的懸殊，說明與《地理書》、《地記》的概念或不盡相同。沈約〈州郡志〉用語「地理雜書」，也許可進而推測齊、梁時有較為集中的描述語彙，但概念上可能沒有絕對共識。

從《隋志》著錄看來，陸、任「地理書」、「地記」概念範圍廣泛，主要有：1、六朝以前地理作品《山海經》、《水經》的晉注及（東晉末？）庾仲雍《江記》、《漢水記》等山川水文記錄；2、宮殿建築的《洛陽宮殿簿》、《三輔故事》等；3、風土、風俗的《風土記》、《陳留風俗傳》；4、記錄遊歷見聞的《述征記》、《西征記》、

《遊行外國傳》、《佛國記》等；5、遊賞山水的《遊名山志》、《居名山志》；6、載記異域、異物的張華注《神異經》、《南州異物志》、《發蒙記》等；7、歷史性質的《蜀王本記》、《蜀志》；8、全宇總記式的《十洲記》、《永初山川古今記》、《元康三年地記》等；9、相對數量較多的地方記，如《吳興記》、《會稽記》、《荊州記》、《湘州記》等。成書時間從漢到南齊皆有而集中在晉、宋兩代，所記則莫不與土地、地理、地方有關，如山水情狀、都城宮殿、風土民俗、區域見聞、蜀地歷史、天下地理及地方專記等，都明顯貼合著「地」的性質，為最主要交集。實際地域空間則涵蓋有洛陽、巴蜀、長江中下游流域州郡及南方交州、珠崖等，多晉、宋時所在區域。作品情況單卷、二卷為多，二十卷以上少數。雖然所歸納對象僅及兩編五分之一左右的內容，但《地理書》、《地記》存目情況是相對隨機的，故所得概念應具一定參考度。

陸、任《地理書》、《地記》系列外，《隋志》還著錄有 80 多種含隋代以前的地理文獻，六朝之作約在 50 餘種之數，顯然都是不屬上二編的內容。一種是二編未採錄，一種是成書於其後的梁、陳及北朝作品。從書目內容看，1、仍有少量《山海經》、《水經》注本；2、有三部《地理書抄》，是陸、任二編的衍生節本；3、異物志之類的述作增加；4、風俗記、行記、外國傳也增多；5、全字式的述記多過前見；6、出現《洛陽伽藍記》、《京師寺塔記》等幾部佛教寺塔精舍記錄，反映時代新風氣；7、州郡記之作雖仍頗見份量，但竟未多過陸、任二編。作品份量單卷、二卷內容差不多居半，其他明顯數量提升，涵蓋區域則開始擴向北方及諸蕃各地。值得注意的是陳顧野王（519-581）《輿地志》三十卷，《隋志》

小序稱：「陳時，顧野王抄撰眾家之言，作《輿地志》。」<sup>30</sup>那麼南北朝末在相當廣泛的範圍內，應該出現過頗為豐富的各種地理作品及州郡述記，才有機會藉抄撰諸家的方式完成全區式地理總記作品，且很可能不限南方範圍。

《隋志》是一部正史經籍志，它的地理文獻概念與內容認知，與陸、任之編當然有所不同。由小序舉列《尚書》、《周官》到《漢書·地理志》的相關發展可知，點明這類作品的終極價值在提供「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達其志而通其欲，齊其政而修其教」<sup>31</sup>，即資治、管理的需求與功能，是以強調天下全版圖的總記。而對於六朝作品，它評論道：

晉世，摯虞依《禹貢》、《周官》，作《畿服經》。其州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業，國邑山陵、水泉，鄉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舊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學者因其經歷，並有記載，然不能成一家之體。<sup>32</sup>

西晉摯虞（250-300），《晉書》有傳，但未言作《畿服經》，此段記載也不見《隋志》以前的作品與記錄。若早在西晉已有涵蓋天下各州郡縣鉅細靡遺資料之作，如此重要作品，何以不見其他相關說明？小序語意更似乎初唐之前老早便已佚亡，陸、任之時或許已未見到。那麼不傳的原因為何？雖說內容屬西晉狀況，政區後世容或改異，但分野封略歷史、山水面貌、民物風俗及先賢舊好等，都未大幅變化，應仍具相當參考價值。《隋志》沒有多作解釋，此段話也無法作為強力證據推求地理之作的發展。隨後《隋志》評論

<sup>30</sup> 魏徵等：《隋書·卷三三·經籍志》，頁988。

<sup>31</sup> 魏徵等：《隋書·卷三三·經籍志》，頁987。

<sup>32</sup> 魏徵等：《隋書·卷三三·經籍志》，頁988。

《畿服經》之後的寫作，雖然也記載有地理相關情況，但這些後學各本其人有限經歷，偏記一方或僅述部分內容，都不再能成就完整區宇、全記錄的體裁。是否在一個側面來說，指出六朝地理之作是多個別區域、偏重內容的作品？

### （三）初唐劉知幾概念賦予、分判所產生的影響

唐代對六朝「地理書」直接進行討論的，有武后、中宗時的史學家劉知幾（661-721）。劉知幾《史通·內篇·雜述》討論主流史籍外自成一體的史料，稱：

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驚。權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紀，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sup>33</sup>

「近古」指漢魏晉南北朝，史家各以不同撰述主旨與性質，發展出並駕齊驅的諸種述作，劉知幾將之概括為十類並分別給予類別名稱。從所釋義、舉例內容看，《隋志》所錄部分陸、任《地理書》、《地記》作品，落在劉知幾「地理書」與「都邑簿」兩類。劉知幾再說明：

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恆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

<sup>33</sup> 劉知幾著，姚松、朱恆夫譯注：《史通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528。

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sup>34</sup>

劉知幾的「地理書」撰述精神與內容，是天下九州、各個地方，山川面貌、物產風俗盡皆不同，是以記錄某一地區、能將本地情況進行載記的即屬此類。「都邑簿」則是歷代帝王之都、擁宮殿建置遺跡，如果能具載規模、體現其規劃制度，不失為對後世的垂鑑。這是首度對魏晉南北朝地理文獻的學術性分析，也因出以相對細膩的分類與判別、說明及定稱，給予後世相當深刻的印象。今天討論「地理書」及相關文獻，主要的概念與認知，其實多來自劉知幾此番論述。但此地的分析與舉例卻也帶來一些困擾，即說明、舉例之簡略而形成的概念認識與混淆問題。

劉知幾「地理書」舉例僅及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記》、羅含《湘中記》等明顯一方之記的作品，與齊梁陸、任《地理書》、《地記》收錄多元相差很大。而常璩（291？-361？）《華陽國志》入列「地理書」，可能也與陸、任之編認知有異。《華陽國志》今仍完整傳世，《隋志》收錄在〈史部·霸史類〉，不見〈地理類〉；《隋志》見到陸、任二編原始目錄並還原了當時尚存的作品書名，《華陽國志》存世而未列入，顯見陸、任原編中未有此書，也即不屬陸、任界定之「地理書」、「地記」文獻。

我們從傳世常璩《華陽國志》內容也可看出，雖有類似地理文獻的書名，但其內容以記巴、蜀、漢中歷史為主，採取正史紀傳體例，本紀非為人物帝王而改以地方為主軸，所記也是地方發展相關歷史，在性質上確屬地方史而非地方記。此外它近四分之三的內容是人物傳記，包括巴蜀其地漢代到後蜀的掌理人物及當地先賢士女

<sup>34</sup> 劉知幾著，姚松、朱恆夫譯注：《史通全譯》，頁 545-546。

等，與陸、任二編不見任何人物傳記屬性大異。而「都邑簿」類別中見陸機《洛陽記》與無題名《三輔黃圖》，這兩部作品也出現在陸澄《地理書》書目中，劉知幾卻別分他類。

劉知幾主要在討論史籍文體，為了各種述作的彼此區隔，他必須突顯各類別的鮮明特色。他的目標也不在嚴格周全的圖書分類，因而顯見為個人認知觀點，確實也未必須完全符應前此史傳目錄或更早原始文獻的概念。然而後遺症卻難免，劉知幾的分析太容易形成既定觀念，「地理書」文獻的範圍因而被大大窄化，主要僅為一個地區的地理與風物，連「都邑簿」都作為並列且在名稱上被區分開來。另後世也因此多將《華陽國志》視為「地理書」，《華陽國志》記人物的特點也連帶置入為「地理書」特質之一，造成在南北朝「地理書」、「地記」相關探討時內容與體裁的混淆。

當我們欲推求六朝「地理書」、「地記」與後來方志發展的關係，首先要確認它們的概念與文獻特質。陸、任二編有最早直接名稱，可是不及涵納南北朝後期作品，何況他們的書目今僅見五分之一且非完整內容傳世，未足說明清晰概念。《隋志》編纂時收書有限，也不盡能表現六朝實際文獻情況，同樣無法據以界定。劉知幾的舉例則過於簡略、籠統，其概念的普遍代表性未知。除此以外，上述這些地理文獻皆未完整實存，在討論、比較時多望題名而生義，若其中有後世偽託，今天僅據題稱就視作真實存在與確定其成書時間，都將在討論時引入更大誤區，有害嚴謹研究。「地理書」、「地記」文獻的概念還有待其它具體引據及後世輯存來協助進一步判定。

### 三、後世引據、輯存、考述所見「地理書」、 「地記」文獻

#### (一) 酈道元《水經注》引據之魏晉南北朝地理類作品

早在南北朝結束前，北魏酈道元（？-527）作《水經注》。此書擴大記錄、闡述古書《水經》，共記天下江河水流千餘條，各說明其水文情況、始發源處與流經地區，在一一解釋地名與考證時，酈道元引據了眾多典籍，豐富地呈現了相關地理、歷史、掌故、人物故事、神話傳說與地方特色等材料。尤其身處北方，未能全數實地勘察，《水經注》適時體現與保留了諸多南方地理著作，這無疑是南北朝地理文獻在當代的一個總體縮影。我們以《隋志》還原陸、任二編書目所建立的概念為基礎，查找《水經注》中類同「地理書」的作品，可有一表列結果及認識。（參見附表一）

附表一列出的 79 種作品及引用統計尚未盡精確，近代學者陳橋驛考證《水經注》共引用 479 種各類典籍，地理類計有 109 種。<sup>35</sup> 事實上因所謂「地理書」沒有明確定義，各家認定不同，是以查檢結果有異。本表以較核心的認知為主，然酈道元稱引時，作品名稱經常省簡或略有改異，或僅稱作者之名，又同名異書或同書異名，稱引時非逐條註明作者及明確區隔，因此在判定與計算上有模糊之處。然畢竟是當代一手記錄，地理文獻蓬勃發展的事實不容懷疑。

<sup>35</sup> 陳橋驛：〈水經注·文獻錄·地理類〉，《水經注研究二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408-436。109種書目中有同書異稱如《禹貢》、《禹記》、《大禹記》；有《山海經》離析出之篇章；有史志地理之作，非僅「地理書」。

酈道元《水經注》本身是一部專業地理之作，除作者本人深入實地考察所得外，大量引據的《魏土地記》、應邵《地理風俗記》及幾部《十三州記》，都是泛記天下各域的內容，加上引據有限但數量豐富的各方地記，《水經注》表現出的地理知識跨越了一般想像。《水經注》引文雖有判斷上的困難，但綜合觀察與歸納，仍可發現大致內容情況。1、引用的文字簡短為多，如卷十六〈穀水〉：「《洛陽記》曰：『陵雲臺西有金市』」<sup>36</sup>；卷三十四〈江水〉：「《宜都記》曰：『渡流頭灘十里，便得宜昌縣』」<sup>37</sup>；卷三十八〈湘水〉：「羅含《湘中記》云：『屈潭之左有玉笥山，道士遺言此福地也』」<sup>38</sup>。2、所引內容多山川面貌或周邊城邑、地名、掌故、民俗等，如卷二十二〈沙水〉：「《陳留風俗傳》曰：『陳留縣裘氏鄉有澹臺子羽冢，又有子羽祠，民祈禱焉』」<sup>39</sup>。卷三十六〈溫水〉：「《林邑記》曰：『松原以西，鳥獸馴良，不知畏弓。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南移之嶺，嶂不踰仞，倉庚懷春於其北，翡翠熙景乎其南。雖嚶謹接響，城隔殊非，獨步難遊。俗姓塗分故也。』」<sup>40</sup>《水經注》中也載有人物傳記，然多出「先賢傳」等作品，非據「地理書」。

## （二）初唐《藝文類聚》引魏晉南北朝地理文獻及部類分布狀況

初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早於《隋志》編修，官修類書《藝

<sup>36</sup> 陳橋驛：《水經注校釋》（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90。

<sup>37</sup> 陳橋驛：《水經注校釋》，頁595。

<sup>38</sup> 陳橋驛：《水經注校釋》，頁666。

<sup>39</sup> 陳橋驛：《水經注校釋》，頁403。

<sup>40</sup> 陳橋驛：《水經注校釋》，頁630。

文類聚》一百卷成書，引據了不少六朝地理文獻。今以資料庫全文檢索方式查檢《藝文類聚》各部類中具體引用情況，同以陸、任二編書目為基礎，可得表列統計（參見附表二）。

附表二所呈現的檢索及統計結果仍難求絕對精確，一則是《藝文類聚》所引諸書，今多亡佚，許多作品已不可確考，因此在觀察引據書目時，望文生義的成分偏高。再者，《藝文類聚》引書體例不嚴，非每書載明作者，而記錄書名亦常見文字省簡或略異，因此既無法判斷究屬同書還是異書，也可能誤判文獻性質。然《藝文類聚》為官修作品，所採應有相當根據，又編於唐高祖初立之時，六朝典籍仍有機會完整見到。今人整理知引有上千種圖書，地理文獻當有所網羅。雖然如此統計未必可據，但從方法角度來思考，若檢索結果多數部類都引用有地理文獻內容，那麼地理書記載範圍或未偏重，反之則不然，可證地理書的核心內容，因此所查詢及統計情況仍具參考價值。

大抵所見，《藝文類聚》集中引據了至少近 80 種六朝地理文獻，其中可在題稱上連繫《隋志》著錄的不到半數。而所引錄的地理文獻又特別出現在「地部州部郡部」、「山部」、「水部」、「居處部」、「草部」、「寶玉部」、「菓部」、「木部」、「獸部」、「鱗介蟲豸部」等幾個部類之中。所謂「居處部」包括宮、闕、台、殿、門、樓、觀、堂、城、宅舍、壇、室、齋、道路等。《藝文類聚》有四分之一人物內容，但引用地理文獻稀少，其他政事與生活部類也所見不多。那麼由此歸納的地理書主要內容呼之欲出，它記載的是一方之地中，地理位置、山川地貌、歷史名勝、植物花果、鳥獸蟲魚等為主的訊息，相對來看，政區沿革、歷史發展、道里土田及人物傳記等較少觸及。

### （三）北宋《太平御覽》引盛弘之《荊州記》分析

時至宋代，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官修類書《太平御覽》一千卷編成。此書原名「太平總類」，有「包羅萬象，總括羣書，紀歷代之興亡」<sup>41</sup>之意。《太平御覽》在原始蒐羅、規劃之時，即立意廣泛納入當時傳世的各部典籍，甚至包含野史小說雜著及詩文內容等，最後具體成書時，光是經史兩部已成千卷《太平御覽》，他部作品與內容於是別析成五百卷《太平廣記》及千卷《文苑英華》，顯見當時收書之富及採錄之全。《太平御覽》書前有一份「經史圖書綱目」，目後載「計一千六百九十件」，是編修其時採錄典籍的書目長編。這份書目只見書名，部分記載有作者，無卷數，也沒有明確分類，但著錄次第隱然見有經、子、史、集、道等順序。其中至少包含有 200 種六朝地理文獻，部分有作者的可比對唐代記錄，而僅書名的仍只能以書目並載及類同來推測。《太平御覽》對單種圖書採錄的豐富及與《藝文類聚》的比較，可以今天得見的南朝宋盛弘之（？-437-？）《荊州記》佚文來窺探。若以今人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錄《荊州記》文為基底，再利用北京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全文檢索來複核及增補。

附表三主要呈現南朝梁、北魏到南宋各典籍中盛弘之《荊州記》佚文收載情況，表格略按各書成書先後排列，每種書區分出單獨見引及多書互見，由此可觀察佚文出處與數量，也可看出選錄隨時間的變化趨勢及前後沿承的關係，另外，約略可據收錄類目判斷佚文的內容性質。然所呈現及統計之結果一樣未得精確，首先，六朝不

<sup>41</sup> 李昉等奉敕撰：《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3。

只一部《荊州記》，為求確切，僅搜載具明確作者的條文，這同時必有相當遺漏。第二，各書引用時文字繁簡不一，也有櫟括或僅略言，皆可能影響檢索結果，也未能在著錄上細膩表現。三各書引用情況複雜，有以「又曰」連續徵引，是以表中多處內容似顯重複，其實是多條引用。當然，資料庫的錯誤過多，也影響查檢精確度，而若各書採引失據，則更直接誤導結果。儘管如此，我們依然能從表中歸結到一些認識。

盛弘之《荊州記》，《漢唐方志輯佚》共收錄 140 條，筆者再據資料庫核對另檢得 62 條，共 202 條。這些佚文，字數多的可近 300 字，其他多數亦皆能表述充分，僅南宋王象之（1163-1230）《輿地紀勝》、祝穆（？-1255）《方輿勝覽》引用相對簡略。其中首見《藝文類聚》徵引的有 25 條，首見《北堂書鈔》的也有 25 條，50 條中為《太平御覽》涵蓋者 26 條，《太平御覽》再首次徵引 77 條，若加上其他也曾收進《太平御覽》的 13 條，《太平御覽》一書在《荊州記》佚文上就涵蓋了 116 條，佔今傳的半數以上且內容都是較為完整的。這說明了北宋初年仍基本完整見到此六朝地理文獻。唐代類書採錄有限，原因與印刷術未發展、依賴手抄有關，圖書資料以呈現重點為主。宋初《太平御覽》可多出《藝文類聚》十倍卷數、四倍條數與字數<sup>42</sup>，與技術支援不無關係。加上政權當局文治宣揚展示之功，《太平御覽》對各原著的採錄很可能幾近全書具完整訊息者。

<sup>42</sup> 據臺灣大學圖書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資料庫說明引，「藝文類聚」共 14,572 條資料，全文總計約 100 萬字。「太平御覽」共 65,633 條資料，總字數約 400 萬字。臺灣大學圖書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資料庫：[http://leishukis.digital.ntu.edu.tw/L303\\_YiWen\\_YuLang/CustomizedHome.php](http://leishukis.digital.ntu.edu.tw/L303_YiWen_YuLang/CustomizedHome.php)（瀏覽日期：2020 年 8 月 5 日）。

盛弘之，生平不詳，僅知南朝宋文帝時曾任宗室臨川王劉義慶（403-444）侍郎。元嘉九年（432）劉義慶出任荊州刺史，南朝宋初期，荊州轄屬範圍相當廣泛，宋樂史（930-1007）《太平寰宇記》引盛弘之《荊州記》言：「元嘉十四年，荊州所領三十郡。……則以荊楊為天下根本之所寄，楚為重鎮」<sup>43</sup>，此即《荊州記》寫作時間。盛弘之到荊州第六年，擁有行政身分與經歷，對三十郡縣有相當熟稔，而從目前得見佚文，具明確郡、縣政區指稱的至少 50 處，顯見具一定地域涵蓋程度。《荊州記》內容，僅據《漢唐方志輯佚》140 條，可歸納如下重點：1、山水景物、狀貌的說明與描繪，時有得名由來之解釋與相關傳說；2、歷史名勝、古跡、名人舊宅的介紹，時繫連相關背景與故實；3、特殊景觀、地貌的描述並連結相關掌故、傳說與神話；4、城邑名稱與得名典故、知名亭台樓閣建築與歷史背景；5、珍奇鳥獸蟲魚、植物作物與民風民俗。此外，各景點均能明記距離與位置，文中也常見引詩賦、諺語或記錄冢墓碑文。本文的假設是諸書交叉引用《荊州記》，《太平御覽》又採錄全面，若佚文內容與體例有共同指向，那麼《荊州記》作品的實質情況應可斷定。它有官方資源與條件，卻沒有顯著的官書及資治傾向，也沒有人物傳記的線索。

盛弘之《荊州記》到了北宋前期《太平寰宇記》還能見到 27 條引用，其中 17 條首出始見，南宋後期的《輿地紀勝》雖也有始見記錄，但它的引用文字簡略又多彙括，還須進一步檢查，而整體引用情況愈來愈少，多沿承前編。後晉劉昫（888-947）等《舊唐書·經籍志·地理類》僅著錄 60 餘部隋以前地理文獻；北宋歐

---

<sup>43</sup>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六》（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 年），頁 304。

陽修（1007-1072）等《新唐書·藝文志·地理類》則有約百部著錄。南宋晁公武（1105-1180）《郡齋讀書志》、陳振孫（1179-1262）《直齋書錄解題》地理類中則除《水經注》、《洛陽伽藍記》等幾部，已不見魏晉南北朝地理文獻影踪。

#### （四）南宋迄今主要輯佚、考述所呈現之個別文獻概念

特別的是南宋末王應麟（1223-1296）《玉海》，這是一部轉引前人資料的類書，其時當然已不見魏晉南北朝地理原典，純據前書摘引、彙輯、編寫。王應麟設置了「地理」類並針對文獻部分提出一個架構，他把先秦兩漢到唐宋的地理作品建為「地理圖」、「地理書」、「異域圖書」等三個次類。「地理圖」據文字記載析出「神農地形圖」、「黃帝九州圖」、「周職方圖」等 70 餘詞條，六朝部分有「晉禹貢地域圖」、「宋方丈圖」等，唐、宋地圖為多<sup>44</sup>；「地理書」也列有「禹山海經」、「周邦國志」等 70 餘詞條，漢魏晉南北朝主要是「十三州志」、「漢陳留耆舊傳」、「應邵地理風俗記」、「晉太康地記」、「齊山川古今記」等 10 餘詞目<sup>45</sup>；「異域圖書」則有「漢別國方言」、「漢異物志」、「漢中興四夷國俗風土」及「晉華陽國志」等，記錄 10 餘部異物志作品，同樣重心在唐宋典籍<sup>46</sup>。王應麟框列出「地理書」，所記錄的作品以全國、全域式的記載為主，故而少見州郡記。他又將「耆舊傳」、「先賢傳」等地方人物傳記也列入，有別於正史藝文志多別列「雜傳」，而《華陽國志》以記載地區被列入「異域圖書」，皆呈現了王應麟的個人

<sup>44</sup> 王應麟：《玉海》（臺北：大化書局，1977年），頁 293-294。

<sup>45</sup> 王應麟：《玉海》，頁 313-317。

<sup>46</sup> 王應麟：《玉海》，頁 335-336。

認識。

其後迄今的整理與概念展現，主要在三方面：一輯佚，宋不知名輯《墨娥漫錄》，收 25 種魏晉南北朝州郡記<sup>47</sup>；元末陶宗儀（1329-1412？）輯、明陶珽（-？1610-？）重編《說郛》，收 50 餘種地理文獻<sup>48</sup>；清代成果則集中在王謨（？-1768-？）《重訂漢唐地理書鈔》、王仁俊（1866-1913）《玉函山房輯佚書補編》、陳運溶（？-1894-？）《麓山精舍叢書》及民國葉昌熾（1849-1917）《殷淡廬叢藁》等幾部叢書，今有孫啟治等編《古佚書輯本目錄附考證·史部·地理類》總結民國以前 280 條魏晉南北朝地理輯佚書目及考證結果<sup>49</sup>。又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重輯宋以前地理文獻，收載魏晉南北朝輯佚書 224 部。劉緯毅直接以「方志」認知並稱說這些作品，他的收錄主要是州郡記、異物志及先賢傳，幾不含記述全域的作品。二書目考，1962 年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廣泛考證秦漢至元的數千種總志與方志，其中秦漢、三國、南北朝存佚者近 350 條。張國淦同樣以之為「方志」，他的收錄含全域式地理記、州郡記、地圖、宮殿記、異物志、風土記、先賢傳、《華陽國志》等，但不含《山海經》、《水經注》與《洛陽伽藍記》，其中先賢傳佔不少份量。三論著，1990 年出版、2003 年修訂，倉修良《方志學通論》提出方志發展三階段說，以魏晉南北朝地記為第一階段。倉修良認為魏晉南北朝九品中正制度與門閥政治共同促成

47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中國古籍總目·叢書部》（北京：中華書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29。收入元陶宗儀編《說郛》一百卷，明鈕氏世學樓抄本。

48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中國古籍總目·叢書部》，頁 95-96。

49 孫啟治、陳建華編：《古佚書輯本目錄附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兼載人物與地理」的「地記」。<sup>50</sup> 首先是先賢傳、名士傳、高士傳等人物傳記大量產生，地方性的人物傳再成先導，只要續增風俗、風土記內容，便完成最初「地記」。他表列東漢至南北朝人物傳記 40 部，地記 136 部，說明二者間的轉換與消長。<sup>51</sup> 由此歸納的「地記」內容重心，有表彰本地人物、記載地理沿革、描繪山水秀麗、敘述地名由來、介紹水利交通及反映物產風俗。<sup>52</sup> 2010 年劉緯毅等《中國方志史》，以秦漢三國《三秦記》、《陳留風俗傳》、《南州異物志》等為方志創始期之作；兩晉南北朝為方志多元時期，有一統志濫觴的《畿服經》、郡國之書《華陽國志》等及專志《水經注》等。<sup>53</sup> 兩部論著都以六朝地理之作為方志發展過程現象，也都直接將地方人物傳記視為內容一部分，也同據《華陽國志》討論地記具體內容，使地記接近後世方志狀況。

由上述整體源流觀察，宋代方志形成以前，六朝地理文獻多名稱籠統，陸澄、任昉《地理書》、《地記》二編，既作為作品名稱，亦可視為對此類文獻的統稱。它的概念範圍主要是地理、地方核心記述，地貌、地景、地物為關鍵重點。唐劉知幾的「地理書」分類，說明了此概念名稱具一定普遍性，然因闡述、舉例有限，僅言及部分州郡記，未能揣測完整觀念。宋代方志形成後，一在相關文獻網羅上會留意到這些過往記載片段，一是現當代學術探究角度需要整合這些性質接近的作品及進行後出體裁的溯源，因此開始以「方志」眼光去詮釋六朝地理文獻、繫連它們的準「方志」特質。「地理書」、

<sup>50</sup> 倉修良：《方志學通論（修訂本）》，頁 105-106。

<sup>51</sup> 倉修良：《方志學通論（修訂本）》，頁 108-115。

<sup>52</sup> 倉修良：《方志學通論（修訂本）》，頁 129-146。

<sup>53</sup> 劉緯毅等：《中國方志史》，頁 38-78。

「地記」是否「方志」前身？是否具備「方志」精神及體裁本質？可否直接前後繫連兩者討論？還須從發展背景、撰述精神、實質體裁等方面再作思考。

## 四、史學精神、散文體裁的魏晉南北朝 「地理書」、「地記」

### （一）「地理書」、「地記」探討的選擇概念

上節已分析，所謂「地理書」、「地記」內容其實包含複雜，擁有好幾種不同性質的書寫與作品，事實上無法以單一發展緣由、寫作心態及體裁來概括。它們從漢代開始陸續出現，原本未具特定作品類別觀念，到了南朝齊梁，某些體裁書寫明顯增多，陸澄則是在個別因素下進行搜羅並給予名稱，這才有了類別作品概念，所以第一個「地理書」、「地記」概念來自陸、任的纂輯。這些作品中最具時代特色的屬州郡記，不僅前此未有，數量也最多，是以唐劉知幾注意的主要是這類文獻，形成「地理書」第二個範圍較小也相對明確的概念。後世在討論「地理書」、「地記」特色及與方志發展關聯時，也幾乎聚焦在州郡志、異物志，並未涵蓋六朝全部地理文獻。至於「耆舊傳」、「先賢傳」，陸、任二編極可能未包含，劉知幾也別析為「郡書」，加入討論是後世觀點。

本節「地理書」文獻的形成與發展，以州郡記為主要探討重心。魏晉南北朝州郡記的出現原因與背景，古典時期罕見討論。當代學術研究有「郡望」說，認為當時世家大族維護自身利益，誇耀家族人才、標榜門第，進而出現鄉賢傳記及人傑地靈意指之地記。有認為南渡後大族封錮山水，自然給予關懷，又魏晉以來士人寄情山水

之風，引發地記撰寫。<sup>54</sup>也有多元發展論，以魏晉時地方勢力、地區觀念增強，各地士人衿誇鄉邦地理之美、人物之盛及社會尚博好異之風影響，又動蕩時期頻繁遷徙流動，地記記述以廣見聞交流。<sup>55</sup>此外，有以為南渡提供士人安逸環境、絕好自然風光，審美追求異於往代，因成新作。<sup>56</sup>以上觀點均能繫連地記佚文，呈現一定的說明與認識，然筆者願重新思考其間之因果，再作關係檢討。

漢魏六朝州郡記作者大都生卒年未詳，寫作時間也難確估，若就《隋志》記載，後漢楊孚《異物志》一卷、（東漢）圈稱《陳留風俗傳》三卷、（蜀）譙周（199-270）《三巴記》一卷、吳顧啓期《婁地記》一卷，那麼早在漢魏便已出現此類作品。西晉之時尚未南渡，有陸機（261-303）《洛陽記》一卷及《水經注》已徵引之潘岳（？-300）《關中記》，可見南遷因素也未能全然解釋它的發展。而確實從東晉開始，州郡記、異物志逐漸大量出現並在南朝達到巔峰。它們的地域分布，據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分省統計，數量明顯集中今江蘇省近 30 條，浙江省 20 餘條，河南、湖北、廣東省都有近 20 條，湖南、四川省則 10 餘條，其他省份僅個位數字，很顯然時間與空間都以東晉南朝為主要重心。那麼它們的討論可分前後兩階段進行：一漢至西晉；二東晉至南朝齊梁。

54 胡寶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州郡地志〉，《中國史研究》，第 4 期（2001 年 11 月），頁 13-25。

55 王琳：〈六朝地記：地理與文學的集合〉，《文史哲》，第 1 期（2012 年 1 月），頁 94-110。

56 彭沈莉：〈求真尚美——東晉南朝地記與文人自然審美觀〉，《中華文化論壇》，第 12 期（2013 年 12 月），頁 13-16。

## (二) 「地理書」、「地記」的形成來自具體生活與文化

對於自然地理的體察，本就是人類生活中必然的連繫與感受，且相當早期便已發展。《山海經》的形成時間未明，內容虛實難辨，可是那些地域結構、山川形貌、里程距離、殊異物產乃至看似誇張的奇民國度，都不像純憑想像虛構得來，它們一定有基本的生活實際經驗依據。西漢司馬相如（約前 179- 前 118）作〈上林賦〉，「左蒼梧，右西極」<sup>57</sup>，從南方交州到長安的廣大地域範圍中，水文流衍、山林據布、奇花異卉、鳥獸蟲魚，描摹之細膩精詳、豐富多變，絕非僅文學想像語言而是深刻生活體察結果。隨著歷史變化與人類生活進展，關乎人與外物場景的書寫也有進一步開展。東漢班彪（3-54）〈北征賦〉、班昭（？-120）〈東征賦〉留下了行旅過程對歷史遺蹟的觀覽與感喟<sup>58</sup>；班固（32-92）〈兩都賦〉、張衡（78-139）二京賦，鋪陳了長安、洛陽兩都城的繁華景象，從形勢所在、歷史淵源、城市結構、自然景觀、宮殿建築乃至民俗事象等無不畢具。<sup>59</sup>西晉承續此風氣，左思（？250-305）構思十年，為魏、蜀、吳三國首都作〈三都賦〉，序言：

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何則？發言為詩者，詠其所志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贊事者

<sup>57</sup>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八》（臺北：華正書局，1982年），頁123。

<sup>58</sup>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九》，卷九，頁142-146。

<sup>59</sup>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一至卷三》，頁21-68。

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sup>60</sup>

左思批評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的京都賦詞藻雖華美、內容雖神奇，卻沒有真實根據。他認為書寫要憑依事物的本真與實情，才值得閱讀者信賴。因此他的〈三都賦〉關於山川城邑必查考「地圖」，鳥獸草木定核實「方志」，務求確切有據、真實可考。這裡的「地圖」與「方志」即《周禮·地官》所言「掌道地圖」與「掌道方志」<sup>61</sup>，非後世志書，也非專有名詞。「方志」推估是異物志之類的作品，而「地圖」顯然也必有文字說明，非僅圖繪，今見晉楊佺期《洛陽記》佚文，又名《洛陽圖》、《洛城圖》<sup>62</sup>，《隋志》即著錄有楊佺期撰《洛陽圖》一卷可證。由此可見，漢代以來早有一方記錄之作。〈三都賦〉另衍生兩個小故事，再為地理性書寫的發展作出證明：一〈三都賦〉出，「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sup>63</sup>，相信不僅為了文采，也重視這樣的題材內容；二陸機當時也想寫這樣的作品，見了左思鉅製而歎服，遂輟筆不書。<sup>64</sup> 陸機有《洛陽記》一卷，絕非偶然，記述與作賦，未必是兩件事。人們隨著生活中的開發與建設，留意特殊事物為之記載，應是相當自然的事情。再看南朝宋劉義慶（403-444）《世說新語·言語》載：

王武子、孫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

<sup>60</sup>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四》，頁74。

<sup>61</sup> 阮元：《十三經注疏·周禮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頁247。

<sup>62</sup>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頁72。

<sup>63</sup> 房玄齡等：《晉書·卷九二·文苑傳·左思》（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頁2376。

<sup>64</sup> 房玄齡等：《晉書》，頁2377。

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崑崙以嵯峨，其水汧渌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sup>65</sup>

王濟（？-？）孫楚（？-293）皆晉武帝時臣子，從二人機鋒對話的側面，可見到當時對自然與人文之深度體察、繫連及審美情感。

### （三）魏晉南北朝史籍撰述富盛的根基

晉室南渡，州郡記、異物志的發展的確較先前有變化，增加了不少歷史背景因素。首先談此時期紙的普及對整體撰述、傳播流通之影響。《太平御覽》引「《桓玄偽事》曰：『古無紙，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sup>66</sup>。桓玄（369-404），東晉末曾短暫篡位建國，但旋即為劉裕所滅。《桓玄偽事》雖不明所出，然此番記載卻非孤證，東晉時期早已使用紙張書寫並品質愈來愈理想。<sup>67</sup>紙的技術進步與普及，使得書寫獲得物質條件支撐，著作成果總體上揚。《漢志》總結西漢及以前典籍 33,090 卷；晉荀勗《中經新簿》著錄 29,945 卷；南朝宋謝靈運《四部目錄》64,582 卷；南朝梁阮孝緒個人之作《七錄》有 44,526 卷；梁元帝蕭繹（508-555）克平侯景之亂，收文德殿藏書及公私經籍，已達 70,000 卷以上。<sup>68</sup>時代的前進，著作思想的成熟，再加上條件的允許，「梁武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sup>69</sup>，著述的蓬勃、傳播的快速、

<sup>65</sup> 劉義慶撰，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74-75。

<sup>66</sup> 李昉等奉敕撰：《太平御覽·卷六百五·文部·紙》，頁 2854。

<sup>67</sup> 王菊華等：《中國古代造紙工程技術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年），116-117。

<sup>68</sup> 魏徵等：《隋書·卷三二·經籍志》，頁 907。

<sup>69</sup> 魏徵等：《隋書》，頁 907。

流通的廣泛可知。

「家有文史」，點出此時期新興飛躍開展的圖書類別「史書」。荀勗《中經新簿》獨立出「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之目錄結構；宋王儉《七志》即使勉強回歸七分法，仍不得不另出「圖譜志」，且為一級類目；阮孝緒《七錄》「記傳錄」分「國史」、「注曆」、「舊事」、「職官」、「儀典」、「法制」、「偽史」、「雜傳」、「鬼神」、「土地」、「譜狀」、「簿錄」等十二分項<sup>70</sup>，所著錄總卷數佔全目三分之一內容。顯然魏晉南朝三百年時間裡，各種述史作品發揮了大量創意及精力投注，展現豐碩的成果。《七錄·記傳錄》類別大抵為《隋志》繼承，我們由後者可見到各類中的具體發展，例「正史」有《史記》、《漢書》的各種注解、音義與研究，更為多數的是為後漢以來各朝代著史，即小序所言：「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sup>71</sup>「雜史」著作更為大宗，小序稱：

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亡。是後羣才景慕，作者甚眾。又自後漢已來，學者多鈔撮舊史，自為一書。……<sup>72</sup>

《隋志》主要是在批評這些非正統史家的一家私紀，但也明白呈現東漢以來世局巨變下，私家述史以備遺亡，及魏晉之後才學之士景慕作史，因而篇籍興盛的事實。此外，「霸史」類言永嘉之亂，各雄強據有中原，諸國事蹟，「當時臣子，亦各記錄」<sup>73</sup>，是一方

<sup>70</sup> 任莉莉：《七錄輯證》，頁7。

<sup>71</sup> 魏徵等：《隋書》，頁957。

<sup>72</sup> 魏徵等：《隋書》，頁962。

<sup>73</sup> 魏徵等：《隋書》，頁964。

之史。就連「職官」這樣的官書，都可以有「搢紳之徒，或取官曹名品之書，撰而錄之，別行於世。宋、齊已後，其書益繁…」<sup>74</sup>。而收書高達 217 部的「雜傳」指地方有德行道藝之士的傳記，即「郡國之書」<sup>75</sup>，那麼「地理」類的記載就不特別意外了。《隋志》小序共同點出一個趨向：東漢以來，正統史官的職責與任務漸漸無法把守，各方國與個人則繼起私修、著作，此時不僅有個人聞見記錄，也有撮鈔舊史、官錄，刪採其要，別行流通於世者。由此推測，《隋志·地理類》中「《元康三年地記》六卷」、「《元康六年戶口簿記》三卷」、「《元嘉六年地記》三卷」及後世輯佚發現之《太康地記》等，或許就類似於官書的鈔錄別傳。

#### (四) 六朝州郡記書寫的時代背景與內涵

州郡記的書寫則屬個人聞見經歷的發揮，史事變化、人物丰采值得記錄，地理異貌、山川奇形、古蹟勝景又何嘗不動心駭目？南渡令播遷士人突然來到完全陌生的環境，與歷史人事之瞬息萬變同屬重大衝擊，也同樣是史事記錄述作的焦點。東晉元帝於江左建國之初，政權尚不穩定，前期皆處在內有權臣篡位野心、雄強叛逆作亂；外則數度北伐、慘澹經營的情況下，兵戎時起，上下動盪。但因政治現實的矛盾，士人一方面又有著偏安的心態與情懷。知名的《世說新語·言語》「新亭對泣」典故：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sup>76</sup>

<sup>74</sup> 魏徵等：《隋書》，頁 969。

<sup>75</sup> 魏徵等：《隋書》，頁 982。

<sup>76</sup> 劉義慶撰，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頁 80-81。

對山水的欣賞與親近自然界，早在西晉玄學發展中產生。竹林七賢開展出自然論玄學，有所謂「順天和以自然，以道德為師友。翫陰陽之變化，得長生之永久。任自然以託身，並天地而不朽」<sup>77</sup>。一般文人無論出身，都傾向漠視俗務，投入清談玄虛並「適意自然景物，鍾情山水風光」<sup>78</sup>，形成一股玄游風潮，此外還有佛教僧侶的釋游、道徒的仙游及文士漫游，山水審美早已成廣大士人族羣精神與實質生活習性。<sup>79</sup>初入江南，儘管播遷倉促，然很快地，士族文人為長江流域秀麗山川所震懾，較過往黃河流域更能有所興發。東晉王羲之（303-361）四十餘人的大型蘭亭宴遊如此<sup>80</sup>，王獻之（344-386）「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sup>81</sup>，短短數語，盡顯會稽山水的晶瑩瑰奇。又顧愷之（348-405）的經典總結：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sup>82</sup>

<sup>77</sup> 嵇康：〈答向子期難養生論〉，收入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三國文·嵇康·卷四八》（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頁1327。

<sup>78</sup> 鍾仕倫主編：《魏晉南北朝美育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260。

<sup>79</sup> 鍾仕倫主編：《魏晉南北朝美育思想研究》，頁258。

<sup>80</sup> 房玄齡等：《晉書·卷八十·王羲之傳》，頁2093：「羲之雅好服食養生，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

<sup>81</sup> 劉義慶撰，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頁130。

<sup>82</sup> 劉義慶撰，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頁128。

此外，更不用說大量的山水詩文及駢文辭賦，展現了東晉南朝士人對江南自然山水風光的探索、發現與讚歎。《隋志》著錄陸澄《地理書》原採錄之作，宋謝靈運（385-433）《遊名山志》一卷。今見佚文：

夫衣食，人生之所資。山水，性分之所適。今滯所資之累，擁其所適之性耳。俗議多云，歡足本在華堂，枕嵒漱流者乏於大志，故保其枯槁。余謂不然。君子有愛物之情，有救物之能。橫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時有屈己以濟彼，豈以名利之場賢於清曠之域耶！<sup>83</sup>

謝靈運以山水為人生命中精神、心靈的滋養，此價值遠過富貴名利，是以寧可放棄錦衣玉食的追求，也要擁抱適合自我才性的自然。表達了對山水的無比愛好與崇仰。宗炳（375-443），南朝宋書法家、畫家，從晉末到劉宋，君王屢次徵召作官，都不就任。自言「棲丘飲谷，三十餘年」<sup>84</sup>。史傳記他：

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當澄懷觀道，臥以游之。」<sup>85</sup>

史傳中記當時敬稱他「宗居士」，陸澄《地理書》曾採錄《衡山記》一卷，宗居士撰，或許就是宗炳隱居衡山的山水自然記錄。又宋雷次宗（386-448）〈與子姪書〉：

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為性好閑，志棲物表。故雖在童稚

<sup>83</sup> 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宋文·謝靈運·卷三三》，頁 2616。

<sup>84</sup> 沈約：《宋書·卷九三·隱逸傳·宗炳》，頁 2278。

<sup>85</sup> 沈約：《宋書》，頁 2279。

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于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臺臺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sup>86</sup>

同樣推崇物表山水，志在高隱山林，講究佛道，通達性理。雷次宗，豫章南昌人，作《豫章記》一卷。其子雷肅之，官至豫章郡丞。州郡記作者，可考的均能繫連他們與所記地的關係，以本地里籍、在任官職或長期居停為主，是以他們能深度掌握在地主要勝境，也能運用一些官方精確記錄，以及對當地全景式之反映。州郡記內容則以何為重心？它被歸類於「地理」而非純文學，當然是因內容客觀記述的成分多過主觀感發，可又不是流水帳式的登錄口吻。遊賞風氣帶來記錄動機，記錄成果獲廣泛反響，再回頭壯大遊賞風氣，二者互為因果。從今見普遍佚文看來，它的表達比較接近深度訪遊報告與專家指南，考求地方重要景點、特出景區，載明地點訊息，記錄相關典故、源起，描述遊歷經驗，既呈現個人行旅心得，似也有指引觀覽的意調，而多出以文學、藝術化的欣賞眼光與口吻。如盛弘之《荊州記》：

新都縣有溫泉，冬月，未至數里，遙見白氣如煙，上下交映，狀如綺疏。又有車輪雙轆形，世人傳，昔有玉女乘車，自投此泉。人時見女子姿儀光麗，往來倏忽。人造泉有一聲，則沸從下出而不可止也。<sup>87</sup>

巴陵縣南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生旬日，勢凌軒棟。道人移房避之，木長便遲，但極晚秀。有外國沙門見之，名

<sup>86</sup> 沈約：《宋書·卷九三·隱逸傳·雷次宗》，頁2293。

<sup>87</sup>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頁212。

爲娑羅也。彼僧所憇之蔭，常著花，細白如雪。元嘉十一年，忽生一花，狀如芙蓉。<sup>88</sup>

宋孔靈符《會稽記》：

會稽山南有宛委山。其上有石，俗呼石匱。壁立千雲，有懸度之險。升者累梯然後至焉。昔禹治洪水，厥功未就，乃躋於此山。發石匱，得金簡玉字，以知山河體勢。於是疏導百川，各盡其宜。<sup>89</sup>

宋雷次宗《豫章記》：

徐孺子墓，在郡南十四里，曰白杜亭。吳嘉禾中，太守長沙徐熙於墓隧種松，太守南陽謝景於墓側立碑。永安中，太守梁郡夏侯嵩於碑邊立思賢亭、松碑亭，今並在。松大合抱，亭世世脩治，至今謂之謝君亭。<sup>90</sup>

無奇不書，是州郡記內容的主要精神。這些表述有平敘狀態，也有驚異奇觀，從選材上看不出特別夸飾、炫耀地方奇美的成分，從文字上也感受不到彰顯、驕矜地靈人傑的語氣，因為幾未見當代人物傳記。所以藉州郡記以申「郡望」之說，尚難尋得堅實依據。而州郡記不載當時地方人物，耆舊傳、先賢傳固為傳記專書，但多屬前代人物，於其時門第標榜是否仍有助益？何況僅為當時諸種著作之一，何以知必與州郡記聯合運作？門閥世族封錮山水之說，則頗有因果錯置的問題。地方士人衿誇鄉邦，一則內容未見明顯聚焦，二則官職在任及他鄉士人也所在多有。至於社會尚博好異風尚，可能多指異物志之類的書寫。東晉南朝確實也發展了志怪述異的作

<sup>88</sup>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頁 218。

<sup>89</sup>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頁 183。

<sup>90</sup>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頁 248。

品，而異物志儘管傳奇成分不少，內容頗富神異，但相對來說記實居高。它們與州郡記中的奇觀異景，與其說是社會好尚的產物，不如說同樣有導果為因的可能，即人無法先憑空想像奇異再去好尚奇異，應該是來到南方新環境並隨著逐步的經營開拓，見識到過去未曾接觸過的大自然異景奇物，因而產生述記，經傳播後才蔚為追奇述異的風尚。

而尚博確實與州郡記有所關聯。史書說陸澄好學，博覽無所不知，當世稱碩學。陸澄希望能修撰宋書，可是沒有達成。《地理書》的纂輯初心很可能即為修史作準備，他收錄漢代以來各種地理作品，希望總結成南朝宋一代史書地理志的鉅細內容，誠如《隋志》史部後序所言：

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眾職，咸所貳焉。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sup>91</sup>

這個理想在任昉也一樣，無所不觀的讀書精神，聚書萬卷，創作數十萬言，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sup>92</sup>。史傳引南朝陳姚察（533-606）言：「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sup>93</sup>，或即六朝史部撰述蔚然成風的最佳註腳。

<sup>91</sup> 魏徵等：《隋書·卷三三·經籍志》，頁992。

<sup>92</sup> 姚思廉：《梁書·卷十四·任昉傳》，頁258。

<sup>93</sup> 姚思廉：《梁書》，頁258。

## 五、「地理書」、「地記」的退場與別於方志之特質

### (一) 文化背景消失與新地理文獻範式的生成

魏晉六朝地理文獻蓬勃發展，也開始往北方傳布，北魏宣武帝、孝明帝時，相當於南朝梁武帝初期，酈道元《水經注》已徵引許多南方地理作品。《隋志》的著錄中也可見北魏闕駟《十三州志》十卷、姚最(536-602)《序行記》十卷、溫子昇(496-547)《魏永安記》三卷，及可能出於北方的《北荒風俗記》二卷、《突厥所出風俗事》一卷等，但數量十分有限。《新唐書·藝文志》網羅較富，於北朝地理文獻亦粗估僅 10 部左右。南朝地理記的發展有文化背景在，北朝沒有同樣基礎，是以如酈道元《水經注》、楊銜之(?-?)《洛陽伽藍記》，記實的內容重心、樸質的表達方式，都與同期南朝有極大差異。

隋唐文化主要沿承北朝而來，又是南北一統的局面，地理相關述作在一開始就必須走上不同道路。《隋志》於隋代地理類中，著錄了幾部以州郡圖經、縣簿為名的作品，並有百卷《隋諸州圖經集》、百二十九卷《隋區宇圖志》、百五十一卷《隋諸郡土俗物產》等大型綜合、全宇眾區的地理文獻，官書性質明顯。至如個人一方州郡記之作，僅諸葛穎(536-612)《北伐記》七卷、隋末唐初蔡允恭《并州入朝道里記》一卷、許善心(558-618)《方物志》二十卷等 10 部左右。入唐以後，據《新唐書·藝文志·地理類》載，160 餘條的著錄中，六朝迄隋仍涵括了 100 條左右，唐代個人之作如王方慶(?-702)《九嶷山志》十卷、初唐鄧世隆《東都記》三十卷、韋述(?-757)《兩京新記》五卷、穆宗時盧求《成都記》五卷等約 40 餘部。從比例上已能推斷唐代在個人地方記上的斷層。

隋唐個人州郡記衰歇原因，有大一統帝國下地方管理之全面規制化，地方記錄由官方掌控，杜絕私家修史。隋文帝開皇十三年（593）「五月癸亥，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sup>94</sup>，而官方則於煬帝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于尚書」<sup>95</sup>，也就是上述《區宇圖志》等官修天下圖志。此時正致力南北陸續一統以來、全國行政區的重新規劃，進而包含田賦、租賦、兵制等重要事項皆須在中央與地方有效管理下推動，因此地理文獻肩負的重任，與個人遊歷經驗分享為主的書寫已然本質大異。據《太平御覽》引《大業拾遺》記載，《區宇圖志》經幾番修訂，新成樣式為：

卷頭有圖，別造新樣。紙卷長二尺，敘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敘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敘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其圖上山水城邑，題書字極細……<sup>96</sup>

一種新設計的官方州郡圖志架構誕生，在內容項目上僅見提出山川、郡國、城邑及公署，卷首還有所敘內容的圖畫，包括山勢水文、城郭大略、公館建築等，甚至特別加長紙幅來配合圖畫呈現。此與南朝州郡記確實大相逕庭，隋代圖志在官書基礎上編纂，似乎也有一定體例，記載著重管理資料且精確紀實，圖文互補。《區宇圖志》修撰過程還有一插曲，總檢虞世基（？-618）又別著《丹陽郡風俗》，丹陽郡屬揚州，即南朝都城建康所在區域<sup>97</sup>。據《太平

<sup>94</sup> 魏徵等：《隋書·卷二·高祖紀》，頁38。

<sup>95</sup> 魏徵等：《隋書·卷三三·經籍志》，頁988。

<sup>96</sup> 李昉等奉敕撰：《太平御覽·卷六百二·文部·著書下》，頁2840-2841。

<sup>97</sup> 沈約：《宋書·卷三五·州郡志·揚州》，頁1029-1030：「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陽為宣城郡，治宛陵。而丹陽移治建業」。

御覽》引《大業拾遺》，煬帝對此書內容有所不悅，認為南朝衣冠人物、華夏簪纓，名都所在，竟被寫成「東夷之人，度越禮義」，因敕追「祕書學士十八人修十郡志」，虞世基先「令學士各序一郡風俗」，最後擇善用之。<sup>98</sup> 由此側面，或許可看出北方朝臣對南方文化的不了解與鄙薄，也對南朝為數不少的地方風俗傳毫無所取。

唐代繼承隋圖志、圖經的纂修，初期有魏王李泰（618-652）《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奏上之時，唐太宗（598-649）稱許：

博采方志，得於舊聞。旁求故老，考於傳信。內殫九服，外極八荒。簡而能周，博而尤要，度越前載，垂之不朽。<sup>99</sup>

《括地志》是一部全國總志，今佚。從佚文中可見引據了一些魏晉南北朝地理文獻，數量並不多。

## （二）唐人學術性角度的負面評析

除了官修圖經，唐人又是如何看待六朝「地理書」、「地記」作品？前已言及，官修類書《藝文類聚》等皆引據過這批典籍，其時仍存世。但從學術眼光來看則多有批評。劉知幾《史通·內篇·雜述》：

地理書者，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闕駟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為樂土，家自以為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為故實。鄙哉！<sup>100</sup>

劉知幾認為官方派任的朱贛地理記與北魏闕駟的《十三州志》

<sup>98</sup> 李昉等奉敕撰：《太平御覽》，頁 2840-2841。

<sup>99</sup> 王應麟：《玉海·卷十五·地理》，頁 323-324。

<sup>100</sup> 劉知幾著，姚松、朱恆夫譯注：《史通全譯》，頁 545。

都是廣記天下州郡的作品，內容記實無偏頗。但個人地方記作則多主觀偏見，揄揚虛美，言過其實。尤其山水得名由來及城池古蹟典故，竟來自街談巷語、俗夫傳說，更是毫無根據。劉知幾以隋唐以來官修圖經的權威性、紀實性與資治性來比較六朝「地理書」、「地記」，非從記遊角度、賞玩風格來觀察，是以多所批判。顏師古（581-645）注《漢書·地理志》，也談到：

中古以來，說地理者多矣。或解釋經典，或撰述方志。競為新異，妄有穿鑿。安處附會，頗失其真。後之學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謬論，莫能尋其根本，今並不錄，蓋無尤焉。<sup>101</sup>

顏師古說六朝地理文獻，有的為前代作品作注，有的撰述一方之記。它們的內容因標新立異而妄有穿鑿附會，常見錯謬。有些人著作時逕自引用，全然不管它們無據的問題，他個人注《漢書》則不打算採錄，以免出錯。對六朝地理文獻幾近全盤否定的態度。杜佑（735-812）作《通典》，在「州郡」部分也有類似顏師古的看法。

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纖介畢書，樹石無漏，動盈百軸，豈所謂撮機要者乎！如誕而不經，偏記雜說，何暇編舉。謂辛氏《三秦記》、常璩《華陽國志》、羅含《湘中記》、盛弘之《荊州記》之類，皆自述鄉國靈怪，人賢物盛。參以他書，則多紕謬。既非通論，不暇取之矣。

或覽之者，不責其略焉。<sup>102</sup>

<sup>101</sup> 班固：《漢書·卷二八·地理》，「顏師古注」，頁1543。

<sup>102</sup> 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卷一七一·州郡·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4451。

杜佑認為地理之作應該是確認區域位置、徵實建置沿革、講論地方要害及展現風土民情，這才是關鍵、有價值的內容。可如果換成連篇累牘的瑣細無用描寫，一樹一石的詳盡介紹，甚至還有荒誕不經的靈怪內容、無根據的說法，有何參考必要？他以小注說明並舉四部作品為例，批評它們內容的侷限與主觀，並再度表明述作《通典》時不予採錄。直到中唐李吉甫（758-814）還是類似論調，他在《元和郡縣圖志》序也說：

古今言地理者，凡數千家。尚古遠者，或搜古而略今。採謠俗者，多傳疑而失實。飾州邦而敘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流於異端，莫切根要。至於邱壤山川，攻守利害，本於地理者，皆略而不書。將何以佐明王，捃天下之吭，制羣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sup>103</sup>

《元和郡縣圖志》是中唐一部重要的官修全國總志，李吉甫提出了它的修纂精神與目標，也是為唐代圖經之作做出概念總結。這樣的文獻是為明君聖主掌握天下大勢、控制百姓生存並安邦定國而來，是以山川丘陵分布、形勢攻守利害為記錄重點。而那些只作州邦虛美、人物記述的作品，援引古典卻不記錄現實，採取俗謠而多失實，完全無法達到地理之書的功能，所批判的正是六朝地理書。

### （三）「地理書」、「地記」與後世「方志」的本質差異

認知的轉移、概念的新塑，從正史、政書、總志角度，講求實用與徵實的地理學新觀念，取代了六朝個人化、饒富文藝趣味的地理文獻。而由此兩種差別正可分判出各與宋代方志發展的深淺關

<sup>103</sup> 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五百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2305。

係。據宋王溥（922-982）《唐會要》「職方員外郎」職掌記述：

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請州圖每三年一送職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如州縣有創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後復故。<sup>104</sup>

建中元年（780）為唐德宗時，文字雖指名州圖，但圖、經一體，合理揣測也有敘述部分。而宋代的吏部「職方郎中員外郎」職掌為：

掌天下圖籍，以周知方域之廣袤，及郡邑鎮砦道里之遠近。凡土地所產，風俗所尚，具古今興廢之因，州為之籍。遇閏歲造圖以進……<sup>105</sup>

兩段文字敘述詳簡不一，但精神無異。而或許因時代背景不同，制度化與否未能作為六朝州郡記關連後世方志的準則。那麼從前幾節所分析州郡記的普遍內容看來，偏於地理景觀、個人經歷、掌故記存，缺乏歷史因革、人物傳記等狀況，與後世方志的差異明顯。以盛弘之《荊州記》為例，今見佚文明確指稱郡縣行政區劃的有 50 餘處，而南朝宋初期荊州領郡 30。據胡阿祥《六朝疆域與政區研究》，東晉荊州領郡 25，屬縣 168，<sup>106</sup> 與宋初情況較接近，但有地方官吏職掌的盛弘之，《荊州記》卻僅記錄了約三分之一的範圍。反觀宋代方志，州、郡、縣志均對全部轄區、所有地方逐一進行記錄。內容上，如以文獻彙集成書的個人著作，宋范成大（1126-1193）《吳郡志》來看，門目包含沿革、分野、戶口租稅、土貢、風俗、

<sup>104</sup> 王溥：《唐會要·卷五九》（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頁1032-1033。

<sup>105</sup> 脫脫：《宋史·卷一六三·職官志》（臺北：鼎文書局，1984年），頁3856。

<sup>106</sup> 胡阿祥：《六朝疆域與政區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頁428-429。

城郭、封爵、牧守、山川、人物、府郭寺、異聞、雜詠等 42 項，<sup>107</sup> 不是魏晉南北朝任何地理文獻所能單書涵蓋的，可見二者在本質上的不同。

回到唐代幾位具代表性的學術觀點都不再體察魏晉南北朝地理文獻性質之差異而直接批判與否定。不論他們的觀點是否全然公允，影響有唐一代甚深。地理著作已然轉型，類同魏晉南北朝地理書題稱的作品也未必屬性相同。唐人未重視及宣揚傳布，種下該地理文獻逐漸散失的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魏晉南北朝地理書、尤其州郡記本身的致命弱點。州郡記是個人知見記錄，所描述具體位置難免籠統，而時移世異，山川、政區名稱或已改異，若非世居當地者，共鳴有限，州郡記讀來便味如嚼蠟。誠如劉知幾對「郡書」的評論「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sup>108</sup>，同樣貼切形容地理書。唐五代之後，宋初《太平御覽》採錄達高峰，同期的樂史《太平寰宇記》以個人之力也頗見收載，前節表三可見，南宋後期則已大幅下降，還不排除是轉引為主。今天的學術認識多以魏晉南北朝地理書佚失於南北宋之交。若以更為精確的描述來說，北宋初期刻書未普遍，中期開始印本才增多，<sup>109</sup> 六朝地理文獻極可能多數沒有獲得雕版印刷的機會，而在中期逐漸零失，終至南宋再也未見。這是它們消失的直接因素。

<sup>107</sup> 范成大：《吳郡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宋元方志叢刊》），頁 694。

<sup>108</sup> 劉知幾著，姚松、朱恆夫譯注：《史通全譯》，頁 542。

<sup>109</sup> 張秀民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插圖珍藏增訂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43。

## 六、結論

從以上推衍與說明，魏晉南北朝「地理書」、「地記」的發展情況及與後世方志的關連，可得如下幾點結論：

(一) 魏晉南北朝「地理書」、「地記」成分複雜，非一時一地之成品，形成因素也各樣。所謂「地理書」、「地記」，最初由南朝齊陸澄與梁任昉編纂地理文獻而獲名，其時極可能是為纂述《宋書》而進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的廣博資料整理。地理文獻或為史書地理志之類內容作準備，記載疆域範圍中地理面貌及風土民情，故而收錄有包含秦漢時山水專書、當代傳注，也擁有魏晉以來記錄洛都的資料，還有各地州郡山川、風物的記載。陸、任二編收書豐富，然以採錄、摘輯為主，各按位置遠近、時間先後編排。惜書與目俱不存，隋唐以來相關認識模糊，概念或廣或狹，指稱不一，致令與後世方志比較時易形成認知不同結果。

(二) 「地理書」、「地記」中「州郡記」為主要特色，具時期代表性風格，後世多針對此描述相關概念。州郡記形成於魏晉，發揚於東晉南朝，玄學思潮遺風是它的開展必要因素，而南渡形成充分原因。魏晉初期作品有限，西晉玄學蔚然成風，在探討名教與自然時興起崇慕大自然意識。晉室南遷，衣冠士人來到江左，優美又陌生的江南風光，吸引士人留連、讚歎，也提供探索的新環境。士人或因宦宦、或屬在地，記錄下地方勝景奇觀，傳述遊賞體驗，留存掌故傳說，風氣相尚下，引起更多類似書寫。

(三) 魏晉南北朝州郡記以記地理特殊景觀、山水風貌、奇形異物與當地關於地理傳說為主，突出地方之秀美與奇特，未見地方官式管理資料及人物傳記。儘管今天所能見到的只有片段佚文，唐

宋類書也有採錄考量，然從多數佚文情況看，幾乎沒有明顯官方行政資料與全境之敘述，顯然傾向個人、主觀化的遊歷記實而非地方簿記。人物傳記初始即未在陸、任收錄中，是以今見部分地理書存目無耆舊、先賢等六朝人物記。後世以地方性作認知原則時，往往將地方人物也算進地理文獻中，非起初的觀念。

（四）魏晉南北朝州郡記的發展於隋唐中斷，主要原因是玄風所尚的文化因素消失。隋唐繼承北朝傳統，對南方文化背景無共鳴，甚至帶有部分鄙夷。加上大一統帝國恢復秩序、效率管理之必要，郡縣規劃、地方治理、文書掌握，促使官方州郡圖經再起。官式記錄政策性取代私人撰述，類同六朝地理書之作一時消失。唐代仍有個人方域寫作，然內容重心已見變化。魏晉南北朝州郡記則在時空環境俱改異的情況下，文字描摹失去現實依附，成為無法提供有效認識的徒文，因而逐漸為人們忽視，終在文獻轉移的關鍵時間點上，未經雕版印刷而傳世。

（五）魏晉南北朝州郡記與後世方志本質、體裁皆有異，直接啟發方志有限。州郡記不含人物，也沒有地方廣泛民生生活記錄，與後世方志體裁的全面性及帶有官方測繪、統計及記載的性質不同。加上隋唐中斷了書寫傳統，魏晉南北朝州郡記又在北宋中期開始逐漸佚失，南宋初期可能都已不易見到。南宋末方志序文中經常提及的六朝州郡記極有可能也是望文生義的結果，未能據以坐實它們在體裁上對方志的影響。

魏晉南北朝「地理書」、「地記」早已未見，相關討論永遠蒙上一層模糊與未知，今天僅能在方法上達成一種可能認識。州郡記還有必要與隋唐圖經（佚文）進行比較，圖經再跟方志對勘，也許我們能稍稍跨越時空的茫昧，析理出方志的形成主線與體裁的根基由來。

## 附錄

附表一：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引魏晉南北朝地理文獻表

《水經注》 引魏晉南北朝地理文獻	條 數	《隋志·地理類》著錄
郭緣生述征記	20	《述征記》二卷，郭緣生撰
郭緣生續述征記	8	
釋氏西域記	22	
竺枝扶南記	5	
東方朔十洲記	2	《十洲記》一卷，東方朔撰
應邵地理風俗記	56	
黃義仲十三州記	2	
秦川記	1	
秦州記	3	
沙州記	4	
魏土地記	63	
周處風土記	1	《風土記》三卷，晉平西將軍周處撰
戴氏（戴延之從劉武王）西征記	15	《西征記》二卷，戴延之撰
晉太康地記	17	
三秦記	5	
三齊略記	2	
伏韜北征記	1	
伏琛齊記	6	

《水經注》 引魏晉南北朝地理文獻	條 數	《隋志·地理類》著錄
晏謨齊記	17	
闕駟十三州記（闕駟地理志）	76	《十三州志》十卷，闕駟
上黨記	2	
中山記	6	
聖賢冢地（墓）記	2	《聖賢冢墓記》一卷，李彤撰
陸機洛陽記	5	《洛陽記》一卷，陸機撰
晉中州記	1	
洛陽地記	1	
潘岳關中記	4	
漢中記	2	
從征記	8	
鄒山記	1	
應邵十三州記	3	
齊地記	1	
吳地記	1	
吳記	5	
吳錄地理志	2	
郭仲產襄陽記	1	
習鑿齒襄陽記	1	
益州記	5	《益州記》三卷，李氏撰 ？
華陽記	4	
宜都記	3	
庾仲雍江水記	2	《江記》五卷，庾仲雍撰

《水經注》 引魏晉南北朝地理文獻	條 數	《隋志·地理類》著錄
庾仲雍漢水記	1	《漢水記》五卷，庾仲雍撰
九州記	1	
武昌記	1	
林邑記	14	《林邑國記》一卷
交州外域記	6	
劉欣期交州記	1	
裴淵廣州記	2	
鄧德明南康記	1	
羅君章（含）湘中記	3	
王歆之始興記	2	
湘州記	1	《湘州記》二卷，庾仲雍撰 ？
遠法師廬山記	2	
尋陽記	1	
錢唐記	2	
嵩高山記	1	
郭義恭廣志	6	
涼土異物志	1	《涼州異物志》一卷
十三州志	47	
樂資九州志	1	
楊氏南裔異物志	2	
豫章舊志	1	
豫章記	1	《豫章記》一卷，雷次宗撰

《水經注》 引魏晉南北朝地理文獻	條 數	《隋志·地理類》著錄
陸氏鄴中記	1	《鄴中記》二卷，晉國子助教陸 翽撰
劉澄之永初山川記	7	《永初山川古今記》二十卷，齊 都官尚書劉澄之撰
盛弘之荊州記	3	《荊州記》三卷，宋臨川王侍郎 盛弘之撰
荊州圖副記	1	
三輔黃圖	9	《黃圖》一卷，記三輔宮觀陵廟 明堂辟雍郊畤等事
陳留風俗傳	20	《陳留風俗傳》三卷，圈稱撰
袁山松郡國志	14	
地理書	2	
地記	2	
春秋土地名	4	《春秋土地名》三卷，晉裴秀客 京相璠撰
冀州風土記		
河南十二縣境簿	2	
西河舊事	1	
謝康樂山居記	2	《居名山志》一卷，謝靈運
東陽記	1	
羅浮山記	1	

附表二：《藝文類聚》引魏晉南北朝地理書分布、數量情況簡表

《藝文類聚》部類	條數	引地理書舉例
卷一、二天部	8	劉欣期《交州記》；《十洲記》；盛弘之《荊州記》；袁山松《宜都山川記》；《陳留風俗傳》
卷三～五歲時部	6	鄧德明《南康記》；陸翻《鄴中記》；《臨海記》；《臨海異物志》；《陳留志》
卷六地部州部郡部	32	山謙之《丹陽記》；劉禎《京口記》；王韶之《始興記》；雷次宗《豫章記》；王孚《安城記》；《太康地記》；《元康地記》；黃恭《交廣記》；黃恭《十四州記》；《地理志》；《遊名山志》；《十州志》
卷七山部	17	庾仲雍《湘中記》；戴延之《西征記》；遠法師《廬山記》；張野《廬山記》；周景式《廬山記》
卷八山部水部	26	孔臯《會稽記》；孔靈符《會稽記》；裴氏《廣州記》；《遊名山志》；《廣志》；《地理書》
卷九水部	31	《宣城記》；《江乘地記》；劉道真《錢塘記》；《武昌記》；《黃圖》
卷十符命部	2	《豫章記》；《武昌記》
卷十七～三六人部	8	《湘州記》；《秦州記》；《南州異物志》
卷三八～四十禮部	14	任豫《益州記》；《荊州圖記》；《秦州記》；伍緝之《從征記》；《黃圖》
卷四一～四四樂部	6	《三巴記》；鄭緝之《東陽記》；段龜龍《涼州記》；《潯陽記》

《藝文類聚》部類	條數	引地理書舉例
卷四五～五十職官部	2	荀綽《兗州記》；《三輔故事》
卷五五雜文部	2	《西京記》；《上黨記》
卷六十軍器部	3	雷次宗《豫章記》；《三齊略記》；《南越志》
卷六一～六四居處部	57	《關中記》；楊龍驤《洛陽記》；伏琛《齊地記》；陸機《洛陽地記》；華延雋《洛陽記》；《華山記》；范汪《荊州記》；徐靈期《南嶽記》；《嵩高山記》；《三輔黃圖》；《洛陽宮殿簿》；《陳留風俗傳》；《三輔故事》
卷六五、六六產業部	3	《三秦記》；《吳地記》
卷六七～七十服飾部	5	《襄陽記》；《南岳記》
卷七一舟車部	3	《晉宮閣記》；《荊州土地記》
卷七二食物部	1	《十洲記》
卷七三雜器物部	4	《十洲記》；《風土記》
卷七四巧藝部	2	《風土記》；《辛氏三秦記》
卷七八、七九靈異部	3	《十洲記》；《辛氏三秦記》
卷八十火部	5	《述征記》；《鄴中記》；《廣志》
卷八一、八二草部	28	《羅浮山記》；顧啟期《婁地記》；裴氏《廣州記》；王歆《始興記》；《南州異物志》；《廣志》；《洛陽宮殿簿》
卷八三、八四寶玉部	22	《十洲記》；戴延之《西征記》；《廣州志》；《廣志》；《三輔故事》
卷八五百穀布帛部	6	《鄴中記》；環氏《吳記》；裴氏《廣州記》

《藝文類聚》部類	條數	引地理書舉例
卷八六、八七菓部	60	五端休《江陵記》；《永嘉記》；《襄陽記》； 劉禎《京口記》；《地志》；《南中八郡志》； 《廣志》；《洛陽宮殿簿》
卷八八、八九木部	45	石虎《鄴中記》；《鄒山記》；《齊地記》； 《永嘉記》；《南越志》；《廣志》；《三 輔黃圖》；《洛陽宮殿簿》
卷九十～九二鳥部	25	《風土記》；《南越記》；《永嘉郡記》；《廣 志》；楊孝元《交州異物志》；《豫章舊志》； 《南越志》；《臨海異物志》
卷九三～九五獸部	19	盛弘之《荊州記》；袁山松《宜都山川記》； 劉欣期《交州記》；《名山記》；楊孝先《交 趾異物志》
卷九六鱗介部	7	《齊地記》；《辛氏三秦記》；《潯陽記》； 《廣志》；《陳留風俗傳》
卷九七鱗介蟲豸部	15	王韶《始興記》；徐哀《南方記》；《臨海 土物記》；《南州異物志》
卷九八、九九祥瑞部	4	段龜龍《涼州記》；《豫章舊志》；《三輔 故事》

附表三：南朝宋盛弘之《荊州記》三卷佚文出處表

宋盛弘之《荊州記》三卷佚文出處	條數	說明
梁劉孝標《世說新語·言語》注	1	僅出《世說新語》注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漁水》 《水經注·沮水》 《水經注·沔水》	3	僅出《水經注》
《水經注·溫水》；《太平御覽》石；《事類賦》石	1	
《水經注·江水》；《文選》江賦注；《太平御覽》洲；《太平寰宇記》枝江縣（後二所引均略少）	1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竹；《藝文類聚》竹； 《太平御覽》竹（後二均稍略）	1	
《齊民要術》娑羅；《太平御覽》娑羅（所引稍略）	1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石鼓山 《藝文類聚》石帆山 《藝文類聚》山 《藝文類聚》宅舍	4	僅出《藝文類聚》
《藝文類聚》冢墓；《北堂書鈔》碑；《太平御覽》 棺（後二所引均稍異）、《太平御覽》碑	1	
《藝文類聚》服鳥；《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索隱；《太平御覽》鴉	1	

宋盛弘之《荊州記》三卷佚文出處	條數	說明
<p>《藝文類聚》楊柳；《太平御覽》楊柳</p> <p>《藝文類聚》泉（稍略）；《太平御覽》溫泉</p> <p>《藝文類聚》城（稍略）；《太平御覽》城</p> <p>《藝文類聚》髑髏；《太平御覽》髑髏</p> <p>《藝文類聚》室；《太平御覽》岩</p> <p>《藝文類聚》溪；《太平御覽》溪</p> <p>《藝文類聚》藥；《太平御覽》菊</p> <p>《藝文類聚》山；《太平御覽》氣（引較略）</p> <p>《藝文類聚》泉；《太平御覽》泉水（稍略）</p> <p>《藝文類聚》山；《太平御覽》三峽（所引稍異）</p> <p>《藝文類聚》巖；《太平御覽》巖、《太平御覽》昭州；《太平寰宇記》昭州；《輿地紀勝》昭州</p> <p>《藝文類聚》雁；《初學記》鴈；《太平御覽》雁</p> <p>《藝文類聚》蚌（稍略）；《太平御覽》城</p> <p>《藝文類聚》溪（所引稍略）；《太平御覽》溪</p> <p>《藝文類聚》山、衡山；《太平御覽》衡山</p>	15	
<p>《藝文類聚》雷；《太平御覽》雷；《後漢書·郡國志》南郡注（後二所引均稍略）</p>	1	
<p>《藝文類聚》湖；《初學記》湖；《太平御覽》湖</p>	1	



宋盛弘之《荊州記》三卷佚文出處	條數	說明
《北堂書鈔》穴；《太平御覽》風；《事類賦》風 《北堂書鈔》穴；《太平御覽》祈雨；《事類賦》雨	2	
《北堂書鈔》酒（引較略）；《太平寰宇記》奉節縣	1	
唐徐堅《初學記》樓 《初學記》霽晴 《初學記》衡山（2） 《初學記》江 《初學記》井 《初學記》歌 《初學記》紙 《初學記》鼓 《初學記》鶴	1 9	僅出《初學記》 據資料庫增補 僅出《初學記》
《初學記》石；《太平御覽》石（2）；《事類賦》石 《初學記》湖（2）；《太平御覽》湖（2） 《初學記》漢水（2）；《太平御覽》漢沔 《初學記》墨；《太平御覽》墨	5	
唐章懷太子《後漢書·張衡列傳》注 《後漢書·王常列傳》注	1 1	僅出《後漢書·張衡列傳》注 據資料庫增補

宋盛弘之《荊州記》三卷佚文出處	條數	說明
《後漢書·郡國志》桂陽郡注（稍異）；《太平御覽》穀	1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注；《太平御覽》廩君；《冊府元龜》種族	1	
《後漢書·胡廣傳》注；宋王欽若《冊府元龜》壽考	1	
《後漢書·王符列傳》注；《輿地紀勝》歸州	1	
唐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長沙國	1	據資料庫增補 僅出《漢書·地理志》注
唐三家《史記·秦始皇本紀》注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注	2	據資料庫增補 僅出唐三家《史記》注
唐六臣《文選》登樓賦注 《文選》江賦注 《文選》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詩注（2） 《文選》王仲宣誄 《文選》南都賦注、雪賦注 《文選》擬魏太子鄴中集詩注 《文選》七命注	8	僅出《文選》注
《文選》風賦注；《太平御覽》穴	1	
《文選》登樓賦注；《輿地紀勝》荊門軍	1	



宋盛弘之《荊州記》三卷佚文出處	條數	說明
<p>《太平御覽》珠；《太平御覽》田；《太平御覽》錢； 《太平御覽》牛；《太平御覽》蛟；《太平御覽》 魚；《太平御覽》鮒魚；《太平御覽》都梁；《太 平御覽》石鍾乳；《太平御覽》龍骨；《太平御覽》 茅</p>		
<p>《太平御覽》洲；《太平寰宇記》江陵縣 《太平御覽》峽；《太平寰宇記》巫山縣（較略） 《太平御覽》襄州；《太平寰宇記》襄陽縣 《太平御覽》房州、《太平御覽》白馬塞山；《太 平寰宇記》竹山縣（所引稍異）；《方輿勝覽》 均州 《太平御覽》洲；《太平寰宇記》江夏縣 《太平御覽》商山；《太平寰宇記》商洛縣 《太平御覽》菊花源；《太平寰宇記》南陽縣 《太平御覽》峽；《太平寰宇記》夷陵縣</p>	8	
<p>《太平御覽》漢沔；《太平寰宇記》襄陽縣；《輿 地紀勝》襄陽府</p>	1	
<p>《太平御覽》鼓；《事類賦》鼓 《太平御覽》萬歲山；《事類賦》山 《太平御覽》小西山；《事類賦》山 《太平御覽》景山；《事類賦》山（所引較略）</p>	4	
<p>《太平御覽》蘭香；《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p>	1	
<p>《太平御覽》紙；《輿地紀勝》襄陽軍</p>	1	



宋盛弘之《荊州記》三卷佚文出處	條數	說明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江陵府（3） 《輿地紀勝》襄陽府（2） 《輿地紀勝》澧州 《輿地紀勝》峽州 《輿地紀勝》衡州 《輿地紀勝》枝江縣（3） 《輿地紀勝》歸州 《輿地紀勝》復州 《輿地紀勝》賀州	6       7	僅出《輿地紀勝》     據資料庫增補 僅出《輿地紀勝》
宋祝穆《方輿勝覽》潭州；明嚴衍《資治通鑑補》 後漢乾祐三年注	1	
明董斯張《廣博物志》草木	1	僅出《廣博物志》

## 引用書目

### 一、古籍

1. 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
2. 魏徵等：《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
3. 沈約：《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4年。
4. 蕭子顯：《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
5.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2年。
6. 劉義慶撰，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7. 姚思廉：《梁書》，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
8. 房玄齡等：《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
9. 劉知幾著，姚松、朱恆夫譯注：《史通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
10. 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11. 李昉等奉敕撰：《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
12. 樂史：《太平寰宇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
13. 王應麟：《玉海》，臺北：大化書局，1977年。
14. 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
15. 范成大：《吳郡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宋元方志叢刊》第一冊。
16. 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4年。
17. 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

## 二、專書

1. 任莉莉：《七錄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2. 李致忠：《三目類序釋評》，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年。
3. 胡阿祥：《六朝疆域與政區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年。
4. 倉修良：《方志學通論（修訂本）》，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 年。
5. 張秀民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插圖珍藏增訂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年。
6. 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臺北：鼎文書局，1974 年。
7. 陳橋驛：〈水經注·文獻錄〉，《水經注研究二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8. 陳橋驛：《水經注校釋》，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 年。
9. 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年。
10. 劉緯毅等：《中國方志史》，太原：三晉出版社，2010 年。
11. 鍾仕倫主編：《魏晉南北朝美育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

## 三、期刊論文

1. 王琳：〈六朝地記：地理與文學的集合〉，《文史哲》，第 1 期，2012 年 1 月，頁 94-110。
2. 胡寶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州郡地志〉，《中國史研究》，第 4 期，2011 年 11 月，頁 13-25。
3. 彭沈莉：〈求真尚美—東晉南朝地記與文人自然審美觀〉，《中華文化論壇》，第 12 期，2013 年 12 月，頁 13-16。